

第三章 中泰红色文学之异同

中国与泰国已有长久的亲密交往，根据栾文华著《泰国文学史》的记载是开始于汉朝，到明朝时期达到顶峰。直到曼谷王朝二世王时期，泰国 86% 的外销商品被运往中国，同时进入泰国的中国商船也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就是在这么长期频繁的贸易当中，使中国文学渐渐地渗入了泰国文学当中。中国文学对泰国文学的影响是从翻译文学开始，通过翻译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把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中国文化及政治观念介绍到泰国来。最初时期是从曼谷王朝一世皇开始翻译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等。至于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介绍到了泰国，最早的是鲁迅和茅盾的作品。到后来所翻译出版泰文的中国著名小说有鲁迅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老舍的《骆驼祥子》，茅盾的《子夜》，曹禺的剧本《雷雨》等等一百多部。通过这些作品引入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中反封建反帝的阶级斗争思想，以及抗日时期到泰国避难的中国共产党员，把马克思主义传入了泰国华侨工人农民与知识分子学习小组之内，特别是在50年代泰国红色作家阿斯尼·坡拉詹（乃丕）翻译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毛泽东诗词》，因此在一定的程度上泰国红色文学是受到中国红色文学的影响，尤其是毛泽东革命思想理论，渐渐地渗入了泰国红色作家的思想框架，使他们创作出一些反映革命斗争的现实主义文学，这就是中泰红色文学之间的关系。

红色文学是底层人民的奋斗文学，是作家以亲身经历过的真实情况，通过自己的艺术、想象、虚构和加工提炼，创作出的现实主义作品。揭露了旧社会的不平等，封建礼教的束缚与资产阶级的压迫，为底层人们发出抗议的号角声。所以在不同的国度、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以及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却拥有共同的根源与目的，同样是以马列主义的唯物哲学理论来观察分析社会发展的方向。当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号角声响起，也就呼应了泰国的底层人们的觉醒，激起了他们的奋斗精神。

第一节 中泰红色文学的时代背景与作家经历比较

一、不同的时代背景

中泰红色文学产生的时代背景是不同的。中国很多的红色文学经典作品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创作的。它主要是产生于20世纪50-60年代。那时候新中国已经建立了，由中国共产党统治的红色政权，作家的文学创作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这些红色文学作品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中国红色文学集中产生的时代背景有以下三个特征：

- 有一个统治全国的红色政权
- 有一批长期受中国共产党教育的革命作家
- 有一大群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解放军和革命英雄的热心读者

这就是当时中国红色文学集中产生的时代背景的三个特征的。而泰国红色文学产生的背景与中国红色文学产生的背景有很大的不同。

泰国红色文学产生的年代是在20世纪50-70年代，当时泰国还在军人独裁统治时期。一些具有进步思想和爱民主的红色作家，由于对军人独裁统治的不满，对民主革命理想的憧憬，创作出不少反映社会现实，揭露当时的病态社会、阶级压迫与政治腐败，鼓舞人民反抗斗争，歌颂革命武装斗争和人民军队的文学作品。当时，这些文学作品被当局严格限制和禁止出版发行的，成为了一种地下文学。泰国红色文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具有自己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是：

- 处在军人独裁统治的白色政权时期，红色作家不能自由地创作。
- 作品被禁止出版与发行。
- 除了少数读者之外，对广大读者的影响不大。

这就是处于在军人独裁的白色统治之下，泰国红色文学产生的时代背景所具有的三个特征。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中泰两国红色文学所产生的时代背景是有很大的差别。

二、创作背景之异同

中国红色作家大都是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他们以自己的实际经验，把革命战争的重大历史事件与真实的历史人物引进小说的创作领域，创作出波澜壮阔的革命文学作品。如杨沫说：

英雄们的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主要是七·七事变前白区斗争的那一段）的惊人事迹，加上我个人的一些生活感受、生活经历，这几个方面凑在一起便成了《青春之歌》的创作素材 [1]。

杨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冀中十分区的抗日干部，亲身经历过抗战的残酷生活，是她毕生中最紧张的一段生活，也是她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最难以忘怀的记忆，使她有心要写出几部描述抗日战争的文学作品来，才对得起多年培养自己的党，才能不枉活一生。同时她耳闻目睹的无数英烈的感人事迹，对她造成了强烈的冲击，有了不吐不快的冲动。于是暗下决心，要在自己的作品中把这些可歌可泣的烈士形象再现出来，永留人世 [2]，此为《青春之歌》的创作背景与动机。

泰国红色作家多是文学界中的爱国、爱民主、爱自由的文人与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也经历过抗日战争时期，或是乡农的土地革命与工人的战斗活动，却还没有发展到无产阶级的武装战斗场面。与中国红色作家相同的是他们同样都是以自己身历其境的社会现实情况为创作题材，如西巫拉帕他住在曼谷的一条名叫皇后的胡同里，那里住着一些贵族，目睹了不少贵族女子被束缚在封建家庭里，三四十岁仍然不能结婚，即使结婚了也没有得到幸福，这就是一部被封建宗法制度葬送的贵族女子《画中情思》的创作背景 [3] (P. 231)。

[1] 杨沫. 谈谈青春之歌里的人物和创造过程[J]. 文学青年, 1959, (1).

[2] 陈樱. 青春之歌诞生的前前后后[C]. 1994. <http://www.cnki.net>.

[3] 栾文华. 泰国文学史[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

《向前看》是西巫拉帕以 1932 年泰国资产阶级维新政变前后的社会生活为背景，真实地反映了那一时期各阶层人物的思想面貌。小说的第二部着重描写维新政变后泰国政局的动荡，也反映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和日本帝国主义对泰国的侵略。作者通过作品中鲜活的人物形象，深刻、细腻地描绘了抗日战争时期泰国人民对政府不抵抗政策的不满。

《魔鬼》是社尼·绍瓦蓬以他的家乡北榄府的皖坡地区一场农民与地主绅士的土地纠纷事件而创作的小说。当时恰好发生了大东亚战争，日军侵入了皖坡地区，霸占田地建造军营，当时皖坡农民同心协力机智勇敢对日军抗战，作者因此把这两回事情写到了作品中，创出了一部反帝反封建的现实主义爱情故事——《魔鬼》。

三、作家经历之异同

《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曾就读于温泉女中，因家庭破产而失学，当过小学教员、家庭教师和书店店员，还亲身经历过抗战的残酷生活，从这里使我们不难发现在林道静的身上镶着杨沫的身影。

另外《红岩》是以中国白色恐怖地区的地下斗争、狱中的残酷斗争为背景，作者罗广斌、杨益言都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他们被捕后，在狱中坚持斗争，和难友一起秘密制作五星红旗，迎接解放，经受了从肉体到灵魂的痛楚折磨，经历了黎明前血与火的考验，亲眼目睹了许多革命烈士为革命牺牲的壮烈场面，根据这些亲身经历，写出了革命回忆录《烈火中永生》，随后在这个基础上创作了长篇小说《红岩》。罗广斌拒绝其兄罗广文（蒋介石嫡系，国民党第15兵团司令）的保释，宁愿坐牢，也不写悔过书。从这里我们可看到显现在刘思扬身上的罗广斌形象。

《红日》是吴强亲身参加过莱芜、孟良崮等重要战役而写下的长篇小说，它取材于解放战争初期，“以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最后全歼国民党整编 74 师的史实为依据”[1]。《林海雪原》则是作者曲波在 1946 年冬，率领一支小分队深入林海雪原剿灭国民党残余势力的一场带有

[1] 宋炳辉. 论红日[C]: 2007. <http://www.cnki.net>

传奇色彩剿匪行动为创作背景。除此以外其他的红色作品无论是丁玲的代表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梁斌的《红旗谱》，也都是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创作题材。他们大都是以自己的生活经历，接触相关的人物，收集有关的素材才创作出那些经典的红色文学作品的。

与一些中国红色文学作家相似，泰国红色文学作家的创作也都与作家的生活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但由于泰国的国情与中国的不一样，泰国红色的作家的人生感悟和经历与中国红色作家还是有差别的。虽然在一些文学作品中反映了同一个历史时期和时代背景，如都有描写抗日战争的历史背景和人生经历，也都有描写在农村与地主绅士抗争情况，以及知识分子走向武装斗争的路线。但由于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风俗和语言，在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文化背景，写作风格等方面都有相当的差别。

如西巫拉帕在《生活的战争》中刻画了一个勤劳刻苦的拉宾，他爱好学习，希望将来能成为一个出名的作家，这也就是西巫拉帕自己的愿望。社尼·绍瓦蓬是以他的家乡北榄府的皖坡地区一场农民与地主绅士的土地斗争，和当时皖坡农民同心协力机智勇敢对日军抗战，为《魔鬼》的创作题材。当时泰国农民对地主绅士的反抗还没有发展到武装斗争的地步，而且在白色政权统治之下，不适宜正面地描写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战争的故事，因此作者塑造了一个背叛自己出生阶级的女主人公腊差妮与赛·西玛之间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使作品内容更加完美多彩多姿，把作者所要表达的反抗不合理的社会，建立一个理想社会的深层含义，融入到了一个爱情故事中。这既符合了当时读者的口味，又向读者表达了作者的创作思想。作者刻画了一个出生于贫穷的农民家庭的男主人公赛·西玛，他从小当庙童，在庙里读书识字，亲眼目睹乡亲们为了养活自己和家人，千辛万苦地用自己的血汗开荒种地，使他对农民的生活有了深刻的了解与无限的同情，这也就是作者本身的形象。或是在《瓦拉雅的爱情》中的庸·儒邦央，他不幸沦落于巴黎，在患难当中他结识了几个异乡的好朋友，其中有一个是经过西班牙内战而充满了奋斗经验的觉醒工人“彼得罗”，他向庸·儒邦央讲述了西班牙人民的战斗经验。这也是社尼·绍瓦蓬在任外交职业之时有机会在使馆遇到一位西班牙人，他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和反弗朗

哥的战斗，他对社尼讲述了社会主义的唯物辩证论的这一段经历。

《同一个乡土》是拉丕蓬根据“10.14 事件”青年运动中一批青年知识分子的奋斗经历为主要题材而创作出来的。他还以诗哇·隆那其为笔名，把自己四年坐牢的经验撰写了一部反映泰国监狱生活的回忆录《叻耀书简》。这部作品与“泰国人民律师”通白·通保写的《叻耀共产政治犯》，同样是记录了自己在 1958 年 12 月沙立·达纳腊政变后，以共产嫌疑犯的罪名而被捕入狱的事迹。作者以亲身的经历为素材，描述了他在监狱中的四年生活，以及和两百多名政治犯在一起的狱中经历与监狱当局的机智和顽强的斗争。

《叻耀书简》是他用写给母亲的二十五篇书信的形式而创作的一种书信体的文学作品。作品中的母亲是拉丕蓬虚构的人物，因为他的母亲在他被捕坐狱的前几年就已经去世了，只是有一天他和吉·普密萨去会见吉的母亲时，看见吉与他母亲面带笑容亲热地拥抱时，让他深受感动，自己也分享了这场天伦之乐。因此在他所塑造的母亲身上有两个母亲的身影，两位泰国红色作家母亲的化身，一个是他的母亲形象，另一个是他朋友的母亲形象。拉丕蓬创作这部作品，就是要把自己和其他入狱者在狱中的生活公诸于世，把因莫须有的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强加在入狱者身上的真相告诉读者，揭露军人独裁统治者的腐败、专制和草菅人命，这也是《叻耀书简》的创作背景^[1] (P.3)。

拉丕蓬和《红岩》的作者一样都做过牢，只不过一个是以泰共嫌疑犯的罪名，坐的是泰国军人独裁统治者的监狱，一个是以中共党员的身份，坐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红岩》的作者创作《红岩》时新中国已经成立，他们可以在红色政权的支持下，堂堂正正的以中共党员的身份在红色政权的土地上自由地创作。而《叻耀书简》的作者本身并不是泰共党员，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在思想意识方面同意共产党的主张和做法的党外民主人士。作者的思想倾向马列主义，对反民主的腐败专制的军人政权深恶痛绝，支持人民的革命和斗争。

《叻耀书简》和《叻耀共产政治犯》中所叙述的狱中生活虽然没有像《红岩》中所描写的那么残酷暴虐，没有面对死亡的危险，可是它同样是反映出政治犯与军人独裁统治所进行的勇敢机智的斗争，以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不屈精

[1] 诗哇·隆那其. 叻耀书简[M]. 曼谷: 亚太文学出版社, 2001.

神。拉丕蓬后期创作的作品，无论是短篇小说还是革命诗歌，也都是以作者亲眼目睹的真实的经历为题材而撰写的。

第二节 中泰红色文学的作品内容比较

红色文学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是接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作家用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为指导，以革命活动题材为主而创作出的文学作品。这是中泰红色文学创作思想的共同点。另一个共同点是中泰红色文学的主要内容，都是反映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和自由的正义斗争。

然而由于中泰不同的政治制度、民族文化、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人情风俗、语言特色和作者各自不同的人生经历，使中泰两国红色作家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不同的内容特色，创作视角和文化语境。中国红色文学多是描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阶级斗争，人民解放战争，以及白色恐怖地区的地下斗争等。而泰国红色文学作品是以爱情故事为前景，揭露了当时病态的社会、阶级压迫与政治上的腐败，鼓舞着人民为美好的生活而奋起斗争。泰国红色文学主要描写的是泰国底层人民在贫困处境下的抗争，反映爱国青年知识分子为争取民主自由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以及后来描写的反映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以下分析对比中泰红色文学作品在相同题材上所反映出的不同创作特点和描写手法。

一、反映农民斗争题材的作品比较

泰国红色作家社尼·绍瓦蓬的小说《魔鬼》是一部描写泰国的土地革命爱情小说。作品揭露了地主与地方官同谋勾结霸占农民田地的行径。地主和地方官员对农民的盘剥和侵占农民的土地，导致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的农民沦落成没有耕地的佃户，成为被迫出卖劳力的雇农。

泰国农民除了要受到自然灾害的威胁，而且还要遭受地主豪绅的剥削和掠夺。《魔鬼》中的男主人公赛·西玛得悉家乡发生土地纠纷，就多次进行调查，

知道详情后，他返乡领导农民与地主绅士抗争。由于农民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没有法律知识，因此经常在土地问题上被有钱有势的地主奸商欺骗和欺诈。赛·西玛非常同情农民的遭遇，他不愿意为地主掠夺农民土地打官司，而要为农民维权打官司。作品深刻反映了泰国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反映了农民不能依靠法律来保护自己土地的问题。作品还描写了在赛·西玛的感召下，一些城市青年如倪空、锦添和腊差妮等，也终于下乡支持农民保护自己土地的斗争，投入到了为广大农民维权和反对地主剥削的战斗洪流中。

在《魔鬼》中赛·西玛返回家乡领导农民与地主绅士的抗争。虽没有像中国红色文学作品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里所描写发生在中国农村的轰轰烈烈的武装革命战争，但作品主要也是反映了和揭示了泰国由来已久的农民的土地问题。它或多或少与《咆哮了的土地》中的煤矿工人张进德和知识分子李杰回返家乡去组织农民、散播了革命的星火，激醒了农民的觉悟有些相似。

社尼·绍瓦蓬的另一部小说《瓦拉雅的爱情》也是反映泰国农村问题的一部作品。作品中塑造了庸·儒邦央与瓦拉雅这两个人物。他们通过实践终于发现，他们要做的事在广大的农村里。可是作品中并没有描写到他们下一步的实际行动，也没有深刻地指出实际的社会问题。但在《魔鬼》中的赛·西玛他与《瓦拉雅的爱情》中的庸·儒邦央与瓦拉雅不同，他没有光说不做，而是毅然下乡组织农民的为捍卫自己的土地而斗争。赛·西玛领导农民的维权斗争如何发展，是否能最终取得胜利，作品中并没有给读者一个答案，它给读者留下了一个值得深刻探讨和关注的问题。

如果把中泰红色文学中有关农民题材的作品在内容上做一个排列的话，《咆哮了的土地》似乎是《魔鬼》的后续。因为赛·西玛组织泰国农民斗争只是一个初级阶段，没有达到像《咆哮了的土地》中的中国农民那样，把广大农民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拿起武器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地步。从反映农民题材的作品《后会有期》与《瓦拉雅的爱情》中所描写的农民开始觉醒，到《魔鬼》中描写的农民被组织起来勇敢的斗争，再到《咆哮了的土地》中所描写广大的农民团结起来拿起武器打倒封建地主的革命运动，汇成了一条农民运动从弱到强，从小到大，前赴后继，不断地发展，争取胜利的战斗路线。

二、反映知识分子参加革命题材的作品比较

中国经典的红色文学作品《青春之歌》是以“一二·九”这一段历史时期为背景，描写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青年学生运动。作品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林道静反抗包办婚姻，出走家庭，寻求真理，终于走向革命道路为主要内容。泰国红色文学作品《同一个乡土》也是以10月14日泰国“大学中心”领导的青年反对军阀独裁专政运动为主要内容。当时泰国共产党虽已成立并宣布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可是由于泰共的实力非常微弱，武装力量只是以深山为根据地打游击，没有发展到城乡广大地区。如果说《青春之歌》主要描写的是中国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的战斗，那么《同一个乡土》也可以看成是描写泰国知识分子争取民主反独裁的战歌。

在作品叙事上，《青春之歌》讲述了“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知识分子林道静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奋斗路线成长过程。而《同一个乡土》讲述的泰国的“10.14事件”知识分子和学生出于对当时军人独裁专政的不满，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而爆发的抗议斗争。“10.14事件”后虽然军人独裁政权被推翻，但是泰国政治局势与经济情况并没有好转，阶级压迫依然存在，人民的生活依然陷入贫穷痛苦的深渊，这表明学生运动要与工农相结合，任重而道远。像《青春之歌》中所描写的那样，知识分子在革命道路上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挫折，有迷惘，有退却，有放弃，但更有坚持和执着。

在《同一个乡土》中，作品反映了一些泰国进步青年的成长过程和思想变化，塑造了不同的青年形象。如作品中毕业后的正·文博满怀信心地要把他学成的法学知识带回家乡，为他的乡亲们服务。但在地主和官僚的压榨和威逼下，有些知识分子改变了自己的初衷和志向，但有些人还是坚持下来，不动摇，努力寻找正确的道路，他们当中有些青年就像《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一样，后来终于加入了泰共领导的武装部队。

三、反映监狱斗争题材的作品比较

《红岩》是以重庆解放前夕白色恐怖地区残酷的地下斗争，特别是以狱中斗争为主要内容。它反映了共产党员在白色地区的工作情况，他们随时都有被捕和牺牲的危险，受到敌方的威胁和特务的陷害。《红岩》不仅歌颂赞扬了坚贞不屈的英雄和烈士，同时也揭露了当时国民党的残酷暴虐。

同《红岩》相对比，在反映监狱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叻耀书简》与《叻耀共产政治犯》既没有像许云峰经受的毒刑拷打，没有像江姐受过十指连心这样残忍的描写，也没有像成岗那样被注射“诚实注射剂”，更没有轰轰烈烈的武装越狱那种惊险的描写情节。那是因为当时泰国的政治局势和社会矛盾还没有激化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在1958年沙立元帅政变后所逮捕的共产政治犯，大多数是与政府意见不相合的无辜者，而真正的被捕的共产党员却寥寥无几，这是皆为众所周知的。因此无论是警察还是监狱官对所谓政治犯们的态度并没那么凶狠，没有多少严刑拷打。可是在作品中同样反映了政治犯与军人独裁统治者所进行的勇敢机智斗争的不屈斗争。

在《红岩》和《叻耀书简》中都有对狱中政治犯生活待遇情况的描写。在《红岩》中渣滓洞里的政治犯吃的是乌黑霉臭的碎石饭，而叻耀监狱里的政治犯吃的是参杂泥沙的红饭。为了改善政治犯的待遇与生活情况，他们要求挖鱼池、种菜、养鸡鸭，泰国政治犯的这些要求通过当局的斗争得到了实现。可是在《红岩》里政治犯的待遇比《叻耀书简》中描写的要恶劣得多。比如被俘的新四军龙光华为了保护一个小水坑而被国民党特务毒打致死。

另外，在《红岩》中还有描写政治犯在狱中艰苦学习的情节。如在白公馆政治犯趁在狱中的空闲世界不断地求知学习。这样的描写在《叻耀书简》中也有相似的情节。如吉·普密萨在狱里举办英文学习班，还在暗中举办马列主义学习小组，使有不少的政治犯初时对共产主义毫无见识，后来在狱里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影响。另外，一些文人作家也在狱中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如吉·普密萨在这狱中就创作了不少诗歌与文学作品。拉丕蓬创作的作品也很多，尤其是戏剧与电视剧。在狱中一些政治家与律师们还组织起来开会磋商，为政治犯争

取基本权利，找出打赢这场官司的门路^[1] (P. 63)。

通过《红岩》与《叻耀书简》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中泰两国的政治背景不同，革命斗争的形势不同，但被反动的专制政权关押在监狱中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为民主自由和反压迫反独裁的斗争是相同的，为真理而奋斗的信念和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也是共有的。

四、反映革命武装斗争题材的作品比较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过程当中，许多社会危机都是通过战争来解除的，战争往往是解决政治矛盾的最高方式，每当政治矛盾发展到无法以和平谈判解决之时，就难免以武装暴动一决胜负。如古代希腊荷马的两部著名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古印度的《大史诗》和《罗摩衍那》，到了无法以和平谈判解决问题之时，都以极其残酷猛烈的战争解除其中的矛盾。尤其是底层人民的革命斗争，就是针对权势者的压迫与反抗地主豪绅的剥削，在权势和利益的冲突是绝对不能融和妥协的斗争，只有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解除问题，正如毛泽东在1927年3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说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2]。而红色文学就是反映这场激烈斗争的现实文学作品。

中国红色文学是描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旗帜之下的革命文学，主要是展示出“农村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三大波澜壮阔的历史战役。如反映土地革命战争的《咆哮了的土地》中矿工张进德和知识分子李杰，回到农村去组织农民、成立农会、减租、发动土地革命、最后还是以武装暴动冲出包围，奔向革命力量比较强大的金刚山。反映解放战争的《红日》从1946年第二次涟水战役我军失利写起，到最后全歼国民党王牌军七十四师，展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战争画卷。它以涟水、莱芜、孟良崮三大战役作为中心，塑造了大批立场坚定英勇作战的革命英雄形象。第一个大战役描写国民党军队

[1] 诗哇·隆那其. 叻耀书简[M]. 曼谷: 亚太文学出版社, 2001.

[2] 从毛泽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说起[EB/OL]. <http://www.china.com.cn/>

两次进攻连水城，由沈振新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因伤亡惨重而被迫撤退，涟水终于失守。后来解放军在孟良崮猛烈一战全歼国民党王牌军七十四师，经历了惊心动魄的艰难曲折，经过了无数的牺牲，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杜鹏程写的《保卫延安》是以一九四七年，人民解放军和陕甘宁边区人民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的保卫延安战争，作品以周大勇连长的英雄事迹为核心，描绘了人民战争的历史画卷。

中国红色文学作品几乎每一部都有反映革命武装斗争的内容。一部歌颂青年知识分子的战斗史诗《青春之歌》，也有江华在定县农村中的革命组织会议时，遭受敌军的包围袭击，江华冲出敌军的包围，可是李永光却牺牲了。最后在“一二九”运动中的青年学生队伍，冲破了军警的武装封锁，他们喊着“民众们，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中国人起来救中国呵！”。反映监狱斗争的《红岩》也描写了一场轰轰烈烈、鲜血淋漓的武装越狱，到最后以华子良领着解放军进攻入城解放了重庆。

在泰国红色文学所反映武装斗争的作品较为少，虽然社尼·绍瓦蓬在《魔鬼》中也有反映赛·西玛领导乡村的农民，合力团结拿起武器与地主豪绅的决斗。拉丕蓬在《同一个乡土》中也描写了正·文博与文术终于走向山上的武装斗争路线。“10.14事件”后的红色革命小说，也都启示着只有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才是唯一正确的战斗路线，可是在内容上还是较为浅薄，还没有发展到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这是因为泰国的革命战斗也还没有发展到与官方正面交战的战略进攻地步。

泰国共产党虽在1965年8月7日正式地宣布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但经过了数十年革命武装斗争，武装力量还是非常微弱，除了在偏僻的农村里打游击，袭击地方官的警察局，在深山里的少数民族地区建设根据地以外，还不能展开更大的战斗。10月6日屠杀事件发生后，虽然增加了大批的青年知识分子，但革命武装力量远远不能达到与敌军正面交战的地步，因此泰国共产党主要的作战形式是进行反围剿的战斗。当时泰国政府军对共产党的围剿政策好像是一种循环的现象，那就是在每年初的夏天进行，开始以飞机大炮轰炸，把整个山林轰炸平后，便以步兵进攻搜索，大多数情况政府军也只能占领一个泰共

撤退后留下的空营地，如此这番就算结束了每一次的围剿计划。经过数十年的经验，游击部队也摸透了政府军的围剿政策。由于敌我势力相差悬殊，解放军只能采取战略退却来对付，等到敌军进攻时也只剩下一个空营地了。在革命武装斗争结束后的回忆录文学，就是记录了当年的革命烽火事迹，如：《宋卡解放军》、《普班塔路线》、《普盘山战场》等作品。

《宋卡解放军》一书反映的就是 1977 年泰共在泰南的宋卡部队，抗击泰马联军的‘木沙纳大星’围剿计划而进行的机智勇敢和艰苦坎坷的战斗过程。

《宋卡解放军》是一本纪实文学，书中主要描写的是泰共在宋卡新成立的一支小部队的成长过程。初时这支部队只有十几个战士，他们在宋卡府边境的几个县城进行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吸收了一下新战士的加入。1976 年 10 月 6 日屠杀事件发生后，各界的青年知识分子抱着满怀愤恨的心情，放弃学业背弃家乡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武装部队，使宋卡部队一时增加了大量的青年知识分子，扩大了革命武装力量。1977 年初敌军正开始围剿这支部队，用飞机猛烈轰炸之。由于新加入的人员包括受到官方威胁的群众竟到达一百余人，又没有战争经验，面对这种紧急混乱的情况，部队领导同志只好采取全部撤退的战略。

当时部队处在宋卡山峦一段面积较窄的长方形地带，左边遭到泰军的进攻，右边遇到马军的攻击，部队又不能找个安全歇宿的营地，每天只有在山上与敌军周旋，躲避敌军的包围，如同与敌军玩捉迷藏的游戏。在队伍中还有两个七岁的小女孩和两位孕妇，撤退之前又经过一两次与敌军的交火，有两名战士受伤，情势非常严峻。经过一个多月艰辛困苦的磨练，上队的新同志受到了最严重的考验，吃不饱睡不足，白天终日赶路，夜间又要放哨准备食物。经过一个多月的周旋敌军终于全部撤退了，但部队也渐渐缺乏粮食，有些同志斗志丧失，对革命组织失去了信心，特别是在撤退路途中新旧同志之间的磨擦分裂，不团结，使部队领导决定再往北去，与武装力量较强的泰南三府“博他伦”部队会合。这支部队历经艰难困苦终于打破了敌人的围剿，他们再经过两个多月的教育和统一思想，调整了新旧同志之间的组织关系后，这支部队的战士个个精神饱满、斗志高昂、满怀信心地返回宋卡地区恢复革命工作[1]。巫冬·西素

[1] 索科 1. 革命的故事. 宋卡解放军[M]. 曼谷: 红日出出版社, 2003.

婉在《普盘山战场》也记录了普盘山根据地屡次反围剿的情况，革命武装力量也同样是采取战略退却的战术摆脱敌军的攻击。

革命战争就是以夺取政权为目的，要经过残酷流血的战争。但在实力悬殊敌强我弱的情况，为了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力量较弱的一方往往采取战略退却的战术，待实际成熟再进行战略防御与反攻。《普班塔路线》记录了在泰南三府“博他伦”部队从1965年采取战略退却的政策，后来实力渐渐增大，1977年正式地设立一支“特别游击队”，袭击泰南三府的军营与警察局。“特别游击队”的组织严密精干，行动迅速灵活，趁着敌军没有来得及准备，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术。他们对这一带的警察局与军营进行数十次的进攻袭击，点燃了泰南一带熊熊的革命烽火。同时在附近的“素叻部队”与“洛坤部队”^[1]也各设立一组“特别游击队”，使泰南的革命武装斗争不断发展，惊动了整个泰国。1979年由于国际上共产党国家发生矛盾，它们之间的矛盾导致了武装冲突，这种局势也激发了泰共内部遗留已久的问题，尤其是北方部队与东北部队的知识分子纷纷下山还乡的消息，削弱了仍然坚持革命武装斗争人员的斗志。这时政府军也加紧围剿，后来的每一场战斗都显得非常凶险与激烈，导致更多的战士流血牺牲。1982年泰共中央委员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讨论了当时的不利形势，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但形势仍然不见好转，革命进入低潮，许多有才华的人员也随着革命低潮离开了部队，轰动一时的“特别游击队”终于被取消^[2]。

在对革命战争的描写上，不论是在内容的丰富上，还是在战争的波澜壮阔上，泰国红色文学是不能与中国红色文学相比的，但它们同样都反映出人民革命的艰苦卓绝和英勇牺牲，展现了革命战士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比如《红日》中描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第二次涟水城战役失利，被迫撤退北上山东后，经过一段时期的休整，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增强了战斗力，最后在孟良崮一战全歼国民党王牌军七十四师，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宋卡解放军》中，作品描写了泰共解放军的一支部队，面对政府军命名为“木沙纳大星”的围剿行动，在残酷的反围剿战斗中所表现出来的英勇顽强和不拍牺牲的

[1] “素叻府”与“洛坤府”是泰南两个重要地区也是泰共南方最坚强的两个部队。

[2] 普班塔路线[M]. 普班塔集团出版社, 2001.

精神。由于敌强我弱，形势危急，这支部队同样是往北撤退与泰南三府“博他伦”部队会合。战士们经过两个多月的教育和整修，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调整了新旧同志之间的组织关系，满怀信心地重返“宋卡”地区恢复革命根据地，开展革命工作。《普班塔路线》记录当年革命战争情况，战争的规模不大，并不是与敌军正面交战，但却表现出人民武装斗争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由战略防御到主动进攻的转变过程，展现了那个时代革命者的精神面貌和艰苦卓绝的斗争。

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认为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正义战争被认为是推动社会历史的进程，应该给予肯定和歌颂，而另一种则不然。但是战争总是残酷的，是要流血牺牲的。正如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的会上所说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1] (P.1004)。中国的革命事业经过了长期残酷卓绝的战争，终于取得了全面胜利，成立了新中国，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下，各条战线的英雄战士们受到全国人民的赞扬与歌颂，他们的牺牲被称为重于泰山，他们的英勇事迹世代相传，永留人世。而当年发生在泰国的革命事业虽然是失败，革命队伍也解散了，曾为革命事业而奋斗的革命者不能实现他们的崇高理想，但是他们在革命斗争中同样表现出不畏强暴，不屈服于压迫，敢于斗争和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他们为了争取美好的人生和平等的社会赴汤蹈火，为正义挺身而出，替穷苦人民发出呐喊，为革命理想流血牺牲。他们也同样是功不可没的，是值得赞扬与歌颂的，他们的牺牲也同样是重于泰山的。

[1]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3)为人民服务[EB/OL]. <http://www.crt.com.cn/news2007>.

第三节 中泰红色文学作品的人物形象比较

中泰红色文学作品塑造了众多的革命英雄形象，其中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革命军人。他们为了崇高的理想，为了劳苦大众的幸福，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作品中所塑造的主要人物的生动故事感染和激励了千千万万的后代人。通过分析比较中泰红色文学作品的主要人物形象，可以使我们看到他们相同和不同的人物性格，思想意识，精神风貌和形象特点。

一、工人阶级出生的英雄形象

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年代，工人阶级被认为是最先进的生产力量，他们有着丰富的革命经历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观察力敏锐，有钢铁般的革命意志，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在中泰红色文学中，工人阶级的形象是被描写的一个主要形象。

在中国红色文学作品中塑造了不同身份的来自工人的人物形象。比如《咆哮了的土地》中矿工领袖张进德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不但没有房屋，没有田地，以及其他财产，而且连一个亲人都没有了。他不仅自然朴实、性格豪爽，事事都为农民的利益而着想，同时更以其阶级血缘的强大亲和力，赢得了广大青年农民的支持和拥戴。《青春之歌》中的江华虽是北大的大学生，可是当他十三岁高小毕业后，就跟着父亲在上海当了印刷工厂的学徒，一边做工一边还上了工人夜校。入党之后在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在上海残酷地屠杀工人和革命分子，在一次大逮捕中他脱逃到北平来，他很用功在不过四五个月的时间之内，便自修完了投考大学哲学系的各门功课，考取了北京大学的哲学学系，算是个工人出生的知识分子，经过漫长的革命路途的磨炼，在党的教育领导之下，养成了一个成熟、老练而坚毅充满魄力的共产党员。《红岩》中的许云峰同样是工人出身，他年届中年还是一个单身汉，没有家也没有爱人，曾在长江兵工厂当过几年钳工，他是个火一样热情，钢一样坚强的人，他那明亮深远的目光，充满了

洞察一切的力量，在他面前，从来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和解决不了的问题。他虽被单独关押在渣滓洞，却对所有难友具有巨大的精神感召力，他硬朗的脚步声与铁镣碰响的当啷声，就能把看守们给惊动了。后来，许云峰又被秘密转移到白公馆，关押在潮湿、阴暗的地下室里。临死之前，他还用顽强的毅力，用自己的双手挖出了一个秘密出逃的通道，并留给了其他战友越狱时取用。江姐是个从小就失去了父母的孤儿，九岁开始自立谋生在一家纱厂里当童工。她虽然有了家庭和一个小孩子，可是几乎没享受过家庭的天伦之乐。她把孩子寄托给同志抚养，为了无条件地承担新的革命任务，与她丈夫各分一方。当她被调上华蓥山之时，在将要与她丈夫相见之前，她却看到自己丈夫的头颅被挂在城楼上牺牲了。她忍受着万分的悲愤，继续为革命工作。最让人对她充满了崇敬的是，当她受十指连心酷刑后所说的：“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作者在作品中塑造了张进德、江华、许云峰和江姐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来自工人阶级的典型的革命者的形象。

在泰国红色作品中也塑造了一些工人阶级的形象。比如在乃丕的《母亲！我们胜利了》中纱厂的女工领袖，她宁愿牺牲自己弟弟的性命，也不愿投降退出那场战斗。《女战士》中描写了一些工人不仅过着贫苦的生活，还从事着极其危险的工作。作品还描写了在对待革命态度上，知识分子和有觉悟的工人在革命斗争中所表现出的不同态度和立场。比如知识分子“威”虽然对社会的发展和阶级压迫的问题有较为深刻的了解，可是在斗争的道路上总是动摇不坚定，而“信”他对社会问题虽没有很深刻的了解，但他朴实勇敢意志坚强，是具有共产党员形象的工人战士^[1]（P.103）。

二、农民阶级的人物形象

农民阶级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不管在中国还是在泰国农民都是占人口的大多数，是被压迫和被剥削的主要群体，也是革命的主体，从这点上来说，当时的中国革命和泰国革命也就是农民革命，同时广大的农村也是革命的最安全稳定的根据地和发源地。在《咆哮了的土地》中的矿工领袖张进德，他

[1] 阿斯尼·坡拉詹. 答案在何处[M]. 曼谷：城墙出版社，1990.

经过了四年的矿工生活，虽然已改变了他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但却仍然难以摆脱被剥削与被压迫的生存困境，最后还是回归农村的社会土壤，才能真正寻找到政治革命的发育温床。在泰国红色作品《瓦拉雅的爱情观》中的庸·儒邦央，他为了寻找人生的意义而走遍天涯，最后与他志同道合的瓦拉雅终于发觉只有从广大的农村去扩展，才能体现到真正的社会问题。在以革命斗争为主要题材的红色文学作品中，农民形象是被塑造和描写的主要形象，无论是工人阶级身份或是知识分子身份的无产阶级英雄战士，许多都是出身于农民家庭。如《咆哮了的土地》中的矿工领袖张进德，他出身于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不但没有房屋，没有田地，以及其他财产，而且连一个亲人都没有。《魔鬼》中的赛·西玛《同一个乡土》中的正·文博同样是出生于贫穷的农民家庭。在中泰红色作品中所描写的不同的农民形象大略可分为这样几类：

1. 老一辈的农民形象

《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母亲秀妮是热河省一个偏僻山村里的贫农，与她成天带病的老祖父俩相依为命，没有田地也没有任何的财产，为大地主林伯唐当佃户过活，后来被大地主林伯唐强暴而生下了林道静，之后秀妮便被逐出林家门去，投河自尽了[1]（P.8-10）。在资产注意社会中贫农的身份是最低微的，连猪狗都不如，秀妮就是代表旧中国贫农阶级的悲惨下场。蒋光慈在《咆哮了的土地》中塑造了不同的农民形象。如王荣发为中国老一代农民的典型代表，他消极和守旧，同时也潜伏着革命诉求。他反对他的儿子闹革命参加农会，他认为这是‘违背天理’的思想，亘古以来，哪里有佃户打倒地主的道理？后来连他的女儿也参加了农会工作，使他冷静地想：

也许他的思想是对的，谁晓得！现在的世道是变了。也许这个世界的脸孔要改一改，……唉，也许贵才是对的，让他去……。

后来因为王贵才的惨死，五十多岁的王荣发才彻底觉悟，加入了自卫队的行列[2]。

[1] 杨沫. 青春之歌[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2] 张冀，杨洪承. 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对咆哮了的土地的模仿[C]. <http://www.zhonghualunwen.com>

2. 新一代青年农民的典型形象

蒋光慈在《咆哮了的土地》中塑造了一批新一代的农民革命形象，他们浑身充满着年轻人的叛逆与躁动的力量，对于贫富不均的世道不公，表示不屈不挠。当矿工领袖张进德，为了逃避资本家的杀害，回到农村感召农民激醒了他们的觉悟，成立农会。新一代的农民紧密地团结在张进德的周围，听他讲革命道理，拥护农会成立，参加“斗地主”的革命行动，在火热的阶级斗争中迅速成长为一名立场坚定、意志坚强的革命战士，例如王贵才、毛姑等人物。

3. 受过共产党启蒙教育的农民形象

在《青春之歌》中所塑造了觉醒的农民形象是刘秀英的母亲，她不仅知道庄稼上的知识，知道农民生活的困苦，还懂得生活中的许多道理，懂得农村中阶级斗争是怎样的尖锐，懂得地主、高利贷者盘剥农民的多少花样和残酷的事实。作品中另一个人物是江华的姑母，她是个一贫如洗的农妇，丈夫去世早，只有一个儿子也牺牲了，剩下她孤独一个人，没有家财也没有一亩土地。白天她给地主财家做活，夜晚在农村为农民组织工作，在共产党的领导教育之下她成为了一个有革命觉悟的农民。与此同时《青春之歌》也为读者塑造了革命的农民女性形象。梁斌在《红旗谱》作品中，也描写了朱老忠和严志和两家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觉醒农民形象。

在泰国红色作品中也塑造了不同的农民形象。在拉丕蓬的《同一个乡土》中，作品描写了一个诚实、忠厚的农民形象，如正·文博的母亲。她是个传统的农民，有着纯洁的笑容和诚恳的态度。当珍吉向她介绍父亲时，她缓缓地蹲下合十礼拜。正·文博的母亲是一位无产阶级的革命母亲，她非常信任正·文博和理解他所做的工作，支持他创办村庄学校的愿望，以及对于人民的抗议给予的各种支持与援助。她对正·文博的信心毫不动摇，在她身上可以看到高尔基的作品《母亲》中革命母亲的形象，以及《青春之歌》中刘秀英的母亲和江华的姑母的形象。

《同一个乡土》中，作品不仅描写了这位农民母亲对革命的支持，而且也刻画了她对儿子的理解和信任，使这位农民母亲的形象即朴实、慈祥又坚定自信。比如当报纸上刊登泰南素叻府有五个恐怖分子向官方自愿投降，其中一个恐

怖分子名字叫“正”，与她儿子的名字一样。但她毫不迟疑地说那绝对不是她的儿子正·文博。她说：“我的儿子不会这么做的，他可能会拚死在战场，可是他绝不会投降，也绝不会束手就擒的”这使珍吉深感羡慕，她心里想：“我怎么就没有这么了解我的母亲呢？[1] (P. 165)

在中泰红色文学中，一些作品还描写了农民团结起来向封建势力进行的斗争。如《咆哮了的土地》描述了张进德、李杰领导组织农民，团结一心对地主豪绅发起了土地革命战争。在《红旗谱》中作品描述冀中平原锁井镇的两家三代农民坚持团结，如何大战地主恶霸。社尼·绍瓦蓬在《魔鬼》中也描写了北榄府的皖坡地区农民合力团结拿起武器与地主豪绅的决斗，和英勇机智地与日本侵略者抗争。而《同一个乡土》中，作品描写了正·文博被枪手暗算受伤后，乡村里的男子汉都轮流到医院守卫着他。他创办了村庄的学校，也获得全部村民的支持。他对珍吉说：“只要你站在群众的立场上，群众就永远不会离开你的”[2] (P. 162)。

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

在无产阶级的革命路途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具有多方面的复杂形象，也是革命力量的主要一部分。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虽然有许多缺陷，可是对社会的发展过程与阶级压迫问题倒有更深刻的理解。在社会上他们一方面受到资产阶级与大地主的压迫，另一方面又比工农阶级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虽憎恨腐败的黑社会，又留恋着自己比较优越的生活条件，所以他们在革命道路上容易动摇、冲动、任性和忽冷忽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这些表现在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描写。在《青春之歌》中当卢嘉川提到许宁的犹豫不决之时，他对罗大方说：

许宁也表示愿意去察北，从南下示威回来以后，许多运动他有时露露头，有时连头也不露。这可真是个小资产阶级革命的典型代表——又想革命，又怕艰苦危险[3] (P. 172)。

[1][2] 拉丕蓬. 同一个乡土[M]. 曼谷：冰霜团体出版社，1978.

[3] 杨沫. 青春之歌[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当成岗对江姐提起自己的妹妹成瑶时他说，她“任性得很，小资产阶级习气总是改不掉！”^[1]（P.53）。作品通过不同的人物形象反映了在以工人农民为主力的革命潮流当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容易退缩，在革命高潮时又容易冲动。

在《咆哮了的土地》中，作品也塑造了李杰这个当时知识分子的典型人物。在他身上有很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缺陷与弱点，虽然他背弃了自己出生的阶级参加了革命，但他却不能得到贫苦农民的信赖。他对张进德深受群众信任与爱戴特别忌妒，就连张进德吃饭睡觉等细微动作，都令他感慨万千。当张进德成为了农会会长，而李杰却只配当助手。作品刻画了他身上表现出来的冲动和狂热的思想意识，为了表现他对农民革命的忠心，他无视卧病在床的母亲和年少无知的小妹的生命存在，坚决地下令行动，用火烧了李家老楼，最后还要以“死”为代价，去证明他对农民革命的绝对忠诚。

《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受尽了旧社会的封建压迫和虐待，她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后又遇到了很多挫折和困难，这使她忽然觉得自己身上很脏很臭，同时，又觉得十分委屈。因为这又脏又臭的衣服，并不是她要穿的，而是那个地主家庭给她穿上的^[2]（P.315）。小说通过塑造林道静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揭示了知识分子在革命道路上的心路历程。

在《青春之歌》中的罗大方与《红岩》中的刘思扬都是背叛自己出生阶级的典型人物，他们俩都是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为了参加察北抗日同盟军，罗大方拒绝父亲让他到日本或美国留学的机会。为了表示对党的忠贞不拔，刘思扬也心甘情愿再次被捕，而不愿逃避到香港去留学。许宁则不同，他从小丧父，母亲守寡了二十多年，把他辛苦养大。他是他母亲唯一的希望。他因为犹豫迟疑，被捕入狱。作者描写这一情节就是为了证明惟有把个人问题与家庭问题融入于国家命运中，跟着共产党干革命才是正确选择和正确的道路。

《青春之歌》中的许宁与《同一个乡土》中的沙漫，都是同样受到家庭问题的束缚，使他们不能在革命路线上坚持到底。作品塑造了一组像李杰、林道静、

[1] 罗广斌,杨益言.红岩[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2] 杨沫.青春之歌[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许宁、罗大方、刘思扬和沙漫，这些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当时知识分子的典型人物。

其实在无产阶级的革命路途中，小资产知识分子对革命事业付出的贡献也是功不可没。干革命不能光靠工农的武装暴动力量，还需要有文化、有知识、有革命理论，有正确的战略和战术。在革命道路上，拿起笔干的知识分子在文化教育宣传战线上做出的贡献，是当时多数拿枪杆子的工农战士所做不到的。世界上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虽以工农大众为主力，然而都是以知识分子为领袖的，无论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或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也都是知识分子的身份。在《咆哮了的土地》中的李杰或是《红岩》中的刘思扬与胡浩等人也都负有坚忍不拔的意志，最终都为革命英勇地牺牲了。在《红岩》和《青春之歌》等红色文学中塑造的一些知识分子虽然不是革命领袖人物，但他们也是千千万万个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典型形象。

在泰国红色文学的一些作品中也有对知识分子的描写。泰国的知识分子受过良好的教育，对事物的分析能力较强，是人们所仰望的象牙塔阶层，因此他们居于较为高尚的地位，颇受人们的尊敬与认同。由知识分子领导的某方面的社会运动，往往获得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在红色文学中所反映的知识分子形象也较有特色，都是诚实、纯朴、意志坚定的英勇战士。如《魔鬼》中的赛·西玛，他是个农民出生的知识分子，经历丰富、机智敏锐而又刚强熟练的战士。他的形象与中国红色文学中所描写的拿不定主意的许宁，或是有不少弱点的林道静是不一样的。

《同一个乡土》中的正·文博身上的确是有共产党员的形象，虽然在作品中并没有直接的表明。他是个出生于农民的知识分子，对吃人的社会问题看得很清楚。他对社会的阶级压迫深恶痛绝，具有强烈的革命思想。他对人民要解放必须走革命的道路的观点坚定不移。从他的行为和思想观念上看，很像《咆哮了的土地》中的张进德和《青春之歌》中的江华与卢嘉川的形象。

在泰国红色文学中，作品所塑造的知识分子表现出背叛自己出生的阶级的多是女性形象，这可能与泰国传统文化有关，因为泰国女性对自身承受的压迫

与束缚一向是逆来顺受的，作品中所塑造了背叛自己出生的阶级的女性形象，是对其他女性有一定的鼓舞和启蒙作用。如《魔鬼》中的腊差妮与《同一个乡土》中的珍吉，都是同样出生于富贵家庭。她俩心地善良，热爱自由，捍卫正义。她们在经过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摆脱了自己的阶级束缚，背弃了个人的幸福，献身于为广大群众服务。她们愿为家中的逆子，但却是大众的佳儿。她们是当时泰国小资产阶级在进行思想斗争过程中的典型人物，也是当时泰国进步知识分子的一种思想潮流。他们为了达到崇高的理想而背弃了自己温暖富裕的家庭，与林道静逃避为男人当“玩物”和“花瓶”的命运，而离开了罪恶的家庭是不同的。腊差妮与珍吉的身世跟罗大方和刘思扬非常相似，都是出于富有家庭，她们对人生的选择对自己家庭的责任无疑只是精神上的负担，并不影响到她们家庭的生存问题。作品还描写了一些知识分子的家庭并不富裕，他们一方面参加民族运动和革命斗争，另一方面他们还必须负担起家庭的生活重任就如沙漫与许宁。

通过中泰红色文学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作品从不同的侧面塑造和描写了不同性格，不同生活道路和不同思想理念的知识分子形象。

第四节 中泰红色文学的爱情观比较

爱情是人类之间最甜美最亲密的感情，但是它也有辛酸和痛苦，爱情既能创造人类的幸福，也能毁灭人类的一切，它关注到人类的生活方式、社会的发展以及国家的兴衰于存亡，是千古以来写作的永恒话题。在中国远古的历史途上，古代商纣王迷恋妲己导致亡国，周幽王宠褒姒为红颜一笑而倾城。古希腊的战争英雄史诗《伊利亚特》，它的战争根源也是来自“特洛伊”国王之子“帕里斯”，带走了“斯巴达”国王墨奈劳斯之妻“海伦”返回特洛伊，引起了希腊联军长达十年围攻特洛伊城堡的战争。在中国古代民间爱情传说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他们终不能成眷属，最后立下誓言：生不能同衾，死也要同穴。《天仙配》中的七仙女，感到天宫的岁月过得实在太冷淡寂寞，倒恋慕那人

世间男欢女爱充满温情的生活。她观看渔家从容自由，五湖四海任飘荡，樵夫逍遥自在，打柴唱山歌，庄稼忙耕种，男耕女织度光阴。后来她受到董永的孝心所感动，宁愿受苦落红尘比翼连理在人间。连《真假金牡丹》中的鱼精异类，《白蛇传》中的蛇妖白素贞也为了爱情动凡心，只羡鸳鸯不羡仙，宁愿抛弃千年道行受苦凡间。由上所述让我们感到爱情的魅力是多么伟大，无论是九天玄女或是王孙贵族以及凡人异类，总是向往着天荒地老的真挚爱情，祈求一个美满良缘的人生。

红色文学虽是底层人民的奋斗文学，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它的历史任务是反映社会的弊病与底层的疾苦，激动他们的觉醒、鼓舞他们的奋斗精神，因此它的主要内容是注重反映激烈轰动的阶级斗争，可是也描写了革命路途当中各式各样的不同人物形象，在不同环境下的革命活动所产生的爱情故事。这种革命爱情是建立在共同理想，共同事业和共同情感的基础上的。在中泰红色文学作品中的革命爱情题材表现出别具的特色。

在泰国早期的红色文学，还是限于男女之间罗曼蒂克的爱情世界里，是通过爱情故事来剖析当时资产阶级的刻薄与封建礼教的束缚的爱情悲剧故事，当时是处在军人独裁统治阴影之下，红色作家不能自由地创作，也不适宜正面地描写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战争的故事，况且爱情故事较为符合读者的口味，他们因此把自己所需要表达的深层含义，融入到了一个爱情故事中，如西巫拉帕的《生活的战争》描写的是权势和利益与爱情和道德的战争。《画中情思》则是一部被封建宗法制度葬送的贵族女子的爱情悲剧故事。后来经过“艺术为人生、艺术为人民”的文学运动之后，引入了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理论，使作品中的爱情观逐渐趋向无产阶级的阶级友爱意识，如社尼·绍瓦蓬的《瓦拉雅的爱情》与《魔鬼》，西巫拉帕的《后会有期》等作品。

社尼·绍瓦蓬在《瓦拉雅的爱情》中所描写的是瓦拉雅宽裕高尚的爱情观，她的爱情不是以钱财和利益为目的，她认为那种生活实在太单调没意义，是少数人们既无聊而又落后的狭窄天地。她要爱上一个能献于推动社会前进的劳动人。因此她拒绝了一位名门望族之子“乐瓦”赐予他的爱情。《魔鬼》中的爱情故事是以女主人公“腊差妮”背叛了自己出生的贵族阶级为主。腊差妮出

身于一个世袭的封建贵族家庭，受到严格的封建教育，生活虽然是无忧无虑，可是在受到封建家庭的束缚与封锁使她苦闷懊恼，而乞求自由与解放。她亲眼目睹她的二姐“姐祿妮”在封建包办婚姻的悲惨遭遇，同时她又感触到了她的好朋友平民出生的锦添和倪空的自由恋爱，是多么的朴实、健康、充满了温暖和幸福的生活，与她的二姐门当户对的婚姻相比，有如天地之差，这对她思想有极大的影响，使她认识到了封建包办婚姻的罪恶。因此在她父亲利用举办宴会赛·西玛歧视与凌辱之时，她勇敢地下决心毅然决然地与封建家庭决裂，走向社会去创造自己的新生活。西巫拉帕在《后会有期》中也展现了南希与勾梅之间高尚毫无个人私利的爱情观念，在作品中没有直接的描写他俩之间的爱情故事，勾梅也未曾向南希提起谈恋爱之事，因为在他的眼目中南希是优越的、是高尚的，使他只能对她深藏着爱慕和敬仰的心意，而不敢向她提起恋爱之事。可是从他们俩之间亲密的关怀与互助，可发觉他们俩之间深维的感情。

“10.14事件”后的红色文学作品中，几乎是彻底否认男女之间的爱情。在一些人看来，革命者是不需要爱情的，因而把爱情与革命事业对立了起来。如拉丕蓬的《同一个乡土》中的正·文博就表现得非常明显。

在中国红色文学作品中，对于男女之间的爱情描写是有些比较含蓄，有些是不回避的。虽然《红岩》中所刻画的许云峰、李敬原、成岗等都是单身的共产党员，可是也描写了江姐和彭松涛、成瑶与华为和刘思扬与孙明霞在残酷苛刻的战斗路途中的爱情故事。江姐虽然有了家庭，却没有多少机会享受到家庭的温暖，她与她的丈夫经常因革命工作分居两地，可是《红岩》并不反对革命中男女之间的爱情，甚至江姐还提倡革命中也有爱情，只要它不妨碍革命事业。在描写国共战争史诗的长篇小说《红日》中也描写了沈振新与黎青、梁波与华静、杨军与钱阿菊、胡克与姚月琴之间四对男女的婚姻爱情故事。《红旗谱》也描写了运涛和春兰、江涛和严萍的爱情故事，扩充了生活内容。而《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就有三段不同的爱情模式。《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与《魔鬼》中的腊差妮，都是表现出勇敢地反抗自身遭受的不幸命运，林道静为了逃避当她的养母的利益产品，为了逃脱为男人当“玩物”和“花瓶”，她毅然离开了罪恶的家庭，走向社会寻找生活出路。腊差妮为了寻找人生的自由恋爱，逃

脱封建包办婚姻的悲惨遭遇，终于背叛了自己出生的贵族阶级家庭，走向社会去创造自己的新生活。

林道静的三段不同爱情模式是林道静逃出了扼杀她的黑暗腐朽家庭到杨庄去找她表哥，遇到了居心不良的余敬唐，他欲把她献给鲍县长当姨太太。林道静在走投无路之时投海自尽，被余永泽救起，并为她解决了生活问题，就这样产生了英雄救美的感情。可是林道静需要独立，需要到社会上去做一个自由的人。她返回北平后找不到工作，一次侥幸的机会她在西单一家书店找到了工作，由于流氓的调戏，六天之后她就索性辞了职，一文工资也没有拿到，同时还要躲避胡孟安的危害。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她便答应了余永泽的恳求，与他同居了，林道静第一次与余永泽的爱情结局是为了解决她的生活问题。

第二次是林道静对卢嘉川的爱情。林道静初次见到卢嘉川对他就有一种崇拜和敬仰的爱慕。在作品内容没有直接描写他俩之间的爱情，可是在他们初次见面之时林道静就感到他身上带着一股魅力，而被他那爽朗的谈吐和潇洒不羁的风姿所吸引，使她得一改平日的矜持和沉默^[1] (P.54)。林道静虽然与卢嘉川交谈不多，就深感到他和余永泽大不相同，使她每当落在艰难痛苦或是受严重折磨之时总是怀念着卢嘉川。后来卢嘉川牺牲了，可是他那英俊爽朗的形象还不时地在她脑海里闪耀着。林道静在心里对卢嘉川说：

在漆黑的大风大雨的夜里，你是驰过长空迅疾的闪电。阿多么勇猛！
多么神奇！你高高地照亮了我生命的道路，我是你催生下来的一滴细雨^[2]
(P.448)。

林道静的这种感觉与泰国红色文学作品《魔鬼》中腊差妮对赛·西玛的初次感觉一样，她虽对赛冷漠不闻不问的态度表示极其不满，不过也对赛豪爽、沉重的气概产生一种特殊的印象，而后来被赛的纯朴、宽怀、爱正义的态度所感动而产生了爱情。

第三次是林道静与江华的爱情。这段爱情是林道静与江华在工作与革命事业当中所发生的。作者描写的这三段恋爱故事情节，一是生活的逼迫，二是心

[1][2] 杨沫. 青春之歌[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0.

灵上的崇拜和敬仰，三是实际生活过程产生的三种不同的爱情模式。林道静经过两次与男人的同居，是对于传统贞节理念的大胆挑战。对这方面的描写在泰国红色文学作品中就表现得较为拘束，尤其是在描写女主人公时，无论如何还是要表现她们的贞洁和高尚的形象。

在《同一个乡土》中，珍吉与正·文博他们在“10.14事件”运动中并肩作战。正·文博机智勇敢、立场坚毅、在反对军人独裁的斗争中，他即英勇坚强又温暖，这让珍吉深深地爱上了这位英勇的贫穷人民战士。珍吉与正·文博之间的爱情是在人生奋斗的道路上所发生的情感，它跟林道静与江华之间的爱情有些相似，而珍吉对正·文博所发生的爱慕和敬仰也有点像林道静对卢嘉川的崇拜和敬仰。可是珍吉出生于富贵家庭，她心地善良、爱民主、爱正义，对于穷人的困苦具有同情心，也愿意以一臂之力为他们争一口气，可是她更希望自己能有有个美满的爱情与温暖的家庭，她认为要改造社会、要为革命的崇高理想而奋斗，也不必要抛弃个人的恋爱情感。可正·文博却是把个人的爱情融入极端的阶级友爱之中，他认为若是民族还未获得解放，人民还未过上美好的新生活，我们怎会有温暖的家庭与美满的爱情呢。他把革命爱情和革命事业对立了起来。正·文博的爱情观与瓦拉雅宽裕高尚的爱情观，和南希与勾梅之间高尚毫无个人私利的爱情意识有所不同。

《红岩》中江姐和她的丈夫彭松涛之间是充满了革命的爱情感。江姐把男女之间的爱情与革命事业结合起来共同齐行。华为也是表现出无条件地服从革命事业的爱情观，当组织把他的工作调到川北去之时江姐问他说：“如果将来成瑶不肯来，你安心留在川北么？”。华为毫不迟疑地回答：“不爱川北的人，我决不爱她！”^[1] (P.66)。作品《红日》中描写沈振新和黎青之间的夫妻感情：打仗的时候两个人不能在一起，可是战斗结束后倒比打仗的时候还要紧张，成天成夜开会，忙着工作。有一点空，他又下棋、打扑克玩，也没有什么话和她谈谈。沈振新对黎青的情感世界非常隔膜，甚至漠视了对方的情感的存在，以至于使黎青怀疑他“是不是真懂得爱情”。但当妻子怀孕了，战争又迫使他们分别的时候，他安慰妻子的那句话：“经过这次战争，可能使孩子们不再遇到战

[1] 罗广斌, 杨益言. 红岩[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0.

争!”。显露出一位革命军人内心蕴藏的爱是那样博大深沉[2]。也突破了古代英雄难过美人关的意识。《红岩》中的江姐与彭松涛、《红日》中的沈振新和黎青、《后会有期》中的南希与勾梅和《瓦拉雅的爱情观》中的瓦拉雅都表现出真挚、崇高的爱情观。它与《瓦拉雅的爱情观》中的派集、《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与胡孟安的爱情观是相反的。

此外作者还刻画了男女主人公的郎才女貌形象,《青春之歌》的作者塑造了林道静这个典型形象,林道静的美貌是吸引人的。杨庄的余敬唐为自己的私利,就把她献给了鲍县长当姨太太。另外,作为青年人的余永泽、卢嘉川和江华,也都对林道静的秀美所倾心。《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美既是她人生悲剧的导火索,也是她爱情的连接线。与缺乏真正爱情的余永泽连接,最终断线了。而与有共同的理想和革命事业的卢嘉川和江华相连接,让林道静的美与革命情感连在了一起。另外,《瓦拉雅的爱情》中的瓦拉雅、《魔鬼》中的腊差妮和《同一个乡土》中的珍吉,她们的美既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这种美不但给她们带来了爱情的甜蜜,也由于一些不同的人生理念给她们带来了烦恼和痛苦。

综上所述我们可感到红色文学作品对爱情的描写与揭示,不是通俗文学中的卿卿我我与风花雪月的爱情韵味,而是赞美产生在为了共同理想、共同战斗目的与共同战斗路线当中所产生的爱情,它不仅生动地刻画了作品中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且展现了他们的心灵与情感,同时也剖析了旧社会以钱财利益为目的的爱情,和批判了把革命事业与爱情对立起来的僵化的爱情观。泰国红色文学是通过爱情故事来揭露当时的病态社会与人民的战斗路程,而中国红色文学是反映人民在革命路线当中所产生的爱情故事,这就是中泰国红色文学中不同的爱情观。

[2] 李茂丽. 从红日看当代中国军事文学史诗性写作的困境与可能[J]. 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 2008.

结 语

中国红色文学是在中国革命的道路上和取得革命胜利以后，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文学作品，它描写了中国革命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阶段和进程，再现了当时的革命背景和艰苦卓绝的斗争，展现了流血牺牲和炮火连天的战场，以及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些文学作品塑造了一批在中国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事不同革命工作的英雄群体。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员和无数革命者的代表人物和典型形象。这些革命英雄人物主要以有革命觉悟的、有革命理论的工人、农民、革命军人和革命知识分子为主。中国红色文学兴起在中国漫长的文学史上，虽然只是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却承担了不可忽略的特殊历史任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以特有的文学魅力，人物形象和革命精神，鼓舞、激励和感召了中国人民，影响了几代中国读者，经历了时间的淘洗，流传至今。

在一定的程度上中国红色文学也影响了其它国家的革命者，特别是东南亚的人民革命斗争。如《红岩》、《红旗谱》和《青春之歌》等经典红色文学作品，在泰国、新加坡、马来亚等国都有流传。中国红色文学在泰国的流传也影响了泰国红色文学的创作。在一些泰国红色文学作品中，读者可以看到中国红色文学中一些英雄人物的身影。

泰国红色文学作品反映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它产生在于军人专制的白色统治之下。是泰国红色作家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创出的文学作品，揭露了当时病态的社会、阶级压迫与政治上的腐败，鼓舞着人民为美好的生活而奋起斗争，有些作品还记录了革命武装斗争的经历，对革命后的生活进行了反思。因此泰国红色文学是底层人民的革命文学，是与当时白色政权下低俗的文学作品

相对立的文学，从而导致这些红色文学作品受到当局的限制与禁锢，因而没有多少机会在社会上流传，而成为一种地下文学。可是泰国红色作家不畏强暴，不屈服于权势者。他们为正义挺身而出，为穷苦人民发出呼声，倡导美好的人生与平等的社会。泰国红色文学作品描写了那一代革命者的心路历程，是对泰国历史的记载，是对革命者的颂扬，是对公平、民主、自由社会的向往。泰国红色文学的社会意义和文学价值是不可否定的。

中泰两国虽然有着不同的政治制度、社会背景、宗教信仰以及民族风俗习惯，可是两国红色文学同样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导，或受其影响，是用革命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进行创作的。这些红色文学作品揭露了旧社会的弊病与腐败，鼓舞了底层人民的战斗精神，歌颂了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反映的大都是底层人民的斗争，是追求理想与信念的革命文学，因而也是人民的文学。中泰红色文学的比较研究揭示了红色文学的文学价值和特殊的社会意义。